

周賓賓 编

刘人熙集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湖南人民出版社

周寅宾 编

刘人熙集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人熙集 / (清)刘人熙著；周寅宾编.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9
ISBN 978—7—5438—5918—0

I . 刘 … II . ①刘 … ②周 … III . ①古典诗歌—作品集—中国—清代 ②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清代 IV . I214.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48344号



湖湘文库(甲编)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刘人熙集

资料来源	湖南图书馆
编 者	周寅宾
责任编辑	张人石
整体设计	郭天民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营销部电话	0731—82226732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9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960×640 1/16
印 张	25.25
字 数	262000
书 号	ISBN 978—7—5438—5918—0
定 价	7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置换
厂址：长沙市长沙县黄花镇黄花印刷工业园 邮编：410137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领导小组

顾问 张春贤 周 强 杨正午 周伯华 胡 虹
肖 捷 许云昭 戚和平 谢康生 文选德
孙载夫

组长 蒋建国 路建平

副组长 郭开朗 王汀明

成员 李友志 钟万民 姜儒振 魏 委 吴志宪
刘鸣泰 朱建纲 龚曙光 周用金 朱有志
王晓天 钟志华 刘湘溶 肖国安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任 刘鸣泰 朱建纲

副主任 魏 委 吴志宪 田伏隆 王新国
尹飞舟 龚曙光 唐浩明

成员 唐成红 陈祥东 肖 荣 苏仁进
田方斌 王德亚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任 文选德

第一副主任 刘鸣泰

常务副主任 张光华 彭国华 张天明

副主任 熊治祁 夏剑钦 丁双平 朱汉民 曾主陶
委员 李建国 易言者 汪 华 刘清华 黄楚芳
黄一九 胡 坚 周玉波 雷 鸣 王海东
韩建中 谢冠军 杨 林 章育良

装帧设计总监 郭天民

出版说明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化中独具地域特色的重要一脉。特别是近代以来，一批又一批三湘英杰，以其文韬武略，叱咤风云，谱写了辉煌灿烂的历史篇章，使湖湘文化更为绚丽多彩，影响深远。为弘扬湖湘文化、砥砺湖湘后人，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决定编纂出版《湖湘文库》大型丛书。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以“整理、传承、研究、创新”为基本方针，分甲、乙两编，其内容涵盖古今，编纂工作繁难复杂，兹将有关事宜略述如次：

一、甲编为湖湘文献，系前人著述。主要为湘籍人士著作和湖南地区的出土文献，同时酌收历代寓湘人物在湘作品，以及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部分报刊。

二、乙编为湖湘研究，系今人撰编。包括研究、介绍湖湘人物、历史、风物的学术著作和资料汇编等。

三、乙编中的通史、专题史，下限断至1949年。

四、甲编文献以点校后排印或据原本影印两种方式出版。

五、除少数图书以外，一律采用简体汉字横排。

六、每种图书均由今人撰写前言一篇。甲编图书前言，主要简述原作者生平、该书主要内容、学术文化价值及版本源流、所用底本、参校本等。乙编图书前言，则重在阐释该研究课题的研究视角和主要学术观点等。

七、对文献的整理，只据底本与参校本、参校资料等进行校勘标点，对底本文字的讹、夺、衍、倒作正、补、删、乙，有需要说明的问题，则作出校记，一般不作注释。

八、甲编民国文献中的用语、数字、标点等，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作改动。乙编图书中的标点、数字用法、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等均按现行出版有关规定使用和处理。

《湖湘文库》卷帙浩繁，难免出现缺失疏漏，热望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前言

一、刘人熙的生平

刘人熙（1844—1919），字艮生，号蔚庐，湖南浏阳人。元末明初，始迁祖刘和斋，自江西宦游金陵，徙居浏阳，以后世居浏阳六百年。祖父刘我隆，字见山，先为县书吏，后经商。父亲刘虞，字廉夫，也因病弃儒为商。故刘人熙出身商人家庭。

刘人熙生于清代道光二十四年（1844）。12岁父亲病逝，由母亲教养成人。先读私塾，后入长沙城南书院求学。同治三年（1864），21岁，考取秀才。同治六年（1867），24岁，乡试考取解元。光绪三年（1877），34岁，会试中进士，任工部主事，分管水利。光绪八年（1882）至光绪十年（1884），居母丧。免丧后再任职工部。光绪十五年（1889），应河南总督许振祥聘，为综理文牍的幕僚，历时7年。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任许州知州一年。光绪二十二年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寄居河北通州妻弟王芝祥家5年。其中光绪二十五年（1899）曾短暂署理光州知州。庚子事变时，八国联军进犯通州。他在自己所穿白夏布衫上书写“中原男子刘蔚庐，有志无时”等字，当面抗斥侵略军，表现了临危不惧、大义凛然的爱国精神。

光绪二十七年（1901），刘人熙任江西大学堂总教习。光绪二

十八年（1902）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刘人熙往返于上海、香港、广东、广西、北京之间，在广西桂林任职5年，前4年任广西课吏馆副馆长，第五年任广西法政学堂会办。光绪三十三年（1907）春，返湘，任湖南中路学堂监督，同年冬，任湖南教育总会会长。光绪三十四年（1908），一度入京，又转广西桂林，任法政学堂监督。辛亥革命前数月，返湘家居。

宣统三年九月初一日（1911年10月22日），长沙光复，湖南都督府成立，刘人熙出任民政司第一任司长。民国元年（1912）九月，国民党湖南支部成立，任支部评议员，同时辞去民政司职务，筹办船山学社，被推为首位社长。民国四年（1915），任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历史科主任。同年九月，与女婿贝允昕创办湖南《大公报》。

民国五年（1916）六月，袁世凯死。七月四日，湖南都督汤芗铭仓皇出逃。七月六日，湖南议会与军政界召开联合会议，公推刘人熙为湖南临时都督兼省长。七月十六日，北京政府总统黎元洪任刘人熙暂代湖南督军兼省长。八月三日，黎元洪又特任谭延闿为湖南督军兼省长，调刘人熙赴京，任总统府政治咨议。

民国六年（1917），刘人熙去上海，访问孙中山、黄兴，后回故乡浏阳枨冲。民国七年（1918）九月，又去上海。孙中山得知，前往会见，并送银元1000元作生活费。民国八年（1919）二月，刘人熙在上海病逝，享年76岁。

刘人熙是清末民初湖南的一位进步的政治人物。戊戌变法前夕，他的政治思想还比较保守。他是谭嗣同的老师之一，他写的《书〈兴算学议〉后》，虽称赞谭嗣同的才能与爱国心，但是，不赞成谭嗣同的变法，认为“变法”之论是一种“妄”论，他仍提倡用“周（周公旦）孔（孔子）之道”治国。但是，他的思想能

随时代前进。宣统年间，他已转变为赞同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他在《辛亥阴历除夕咏怀》诗中，歌颂“满蒙回藏成民国”，又歌颂葬黄花冈的义士。他在民国四年（1915）写的《船山学报叙意》中，又宣扬“民国革命为先河，民国建设为宗匠”。这说明他已成为民主革命派。

刘人熙是一位有政治抱负的人。他平生“远瞻诸葛（诸葛亮），近仰船山（王夫之）”（见《蔚庐刘子文集》卷四《续日记弁言》）。但是他“有志无时”。他一生未遇治世明时，无论清末或民初，均是乱世危时。他在清末担任州官与民初担任司长，均不超过一年；代理省长，也只一月左右。任职时间过短，难以取得显著政绩。他一生闲居时间较长，有较多精力从事学术研究与诗文写作。如同其弟刘人蓉在《蔚庐文稿》的批语中所说：“天啬其爵禄，或将昌其文乎！”因此，他的学术贡献与诗文成就超过政绩，成为了湖湘文化名人。

二、 刘人熙的学术贡献

刘人熙的学术贡献，主要是弘扬了王船山学说，这体现在理论与实行两个方面。

理论方面，刘人熙吸收了近代湖湘学者的共识，更明确地阐述和肯定了王船山学说的历史地位。

自清代道光年间以来，湖湘学者认为，王船山具有与顾炎武、黄宗羲并列的历史地位。如邓显鹤说：王船山“当与顾亭林（顾炎武）、黄黎洲（黄宗羲）诸老相颉颃（不相上下）”（见《沅湘耆旧集》）。曾国藩有些文章与书信，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刘人

熙吸收了这种共识，他的《船山书院》诗写道：“夫子乃龙潜，超然顾黄伍。”（见《蔚庐亥子集》卷二）郭嵩焘又说：“王夫之学行为朱子以后一人。”（见《湘阴县图志》）这句话包含了王船山超过了顾炎武、黄宗羲的意思。刘人熙也接受了这种观点，并作了理论上的阐述。其《钞〈四书训义〉数纸付家弟书》说：“先儒传经者众矣，至有宋诸贤出，乃并孔孟之所以致此者而得之。”“船山此书，又并朱子之所以然者而得之。”这段话，将王船山的历史地位与朱熹并列，对“朱子以后一人”的观点发挥得更加具体明确。他还进一步发展了郭嵩焘等人的观点，在《重刻〈四书训义〉序》中评价王船山“天下学士宗之曰：孟子以后一人而已”。又说：“命世亚圣之才，亦庶几近之。”这就是说：王船山已接近孟子的亚圣地位，他在续孔孟“不传之学”方面的成就，甚至还超过了朱熹。

刘人熙还明确地肯定了王船山在湖湘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重刻〈四书训义〉序》评价王船山“楚人士称之曰：‘周子（周敦颐）以后一人而已’”。这就是说，这个观点，是“楚人士”的共识。他个人也完全同意这个观点：“楚自周子以后，惟船山。”（见《蔚庐刘子文集》卷二《程伯翰传》）这句话概括了王船山在湖湘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王船山是继周敦颐以后，又一位伟大的思想家。

实行方面，刘人熙创办了船山学社与《船山学报》。

船山学社创立于民国元年（1912），是我国第一个研究王船山学说的学术团体。刘人熙为发起人兼首任社长。民国二年（1913）至民国四年（1915），该社每周举办演讲会，宣传船山思想，反对袁世凯称帝，将船山学说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体现了学以致用。

民国四年（1915），刘人熙又创办《船山学报》，至民国五年

(1916)，共出8期。该刊第一期刊载了他写的《船山学报叙意》，即该刊的发刊词。该文开头说：“《船山学报》何为而作也？忧中华民国也。”又说：“愿广船山于天下，以新天下。”可见，刘人熙创办该刊，完全出于爱国热忱与忧国意识，还表现了他的“新天下”的理想。该文表明，他的船山研究，注意古为今用。

刘人熙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他深通音乐。《蔚庐四十五自定稿》有为张百熙、欧阳中鹄二友人“鼓良宵引一行”的诗，说明他会奏乐器。他对古代音乐乐理更有深入的研究。《蔚庐刘子文集》中有《记邹忌鼓琴语》、《书钱溉亭〈述古论乐〉八篇后》、《呈请丘穀士祀乡贤辞》、《代南学诸生呈进〈律音汇考〉辞》等文章，都论述了古代音乐乐理。这些文章，是后人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的重要资料。

三、 刘人熙的散文成就

清代的文章，有时文与古文之分。时文指八股文。古文，即刘人熙所说的“散体文”（见《蔚庐刘子集》卷三《再复向笃生书》）。刘人熙时文与古文俱工。他的文章成就，集中在古文。

刘人熙的散文思想，基本上属于清代的桐城派。桐城派的创始人是方苞。王兆符在方苞文集序中说方苞“学行继程朱（二程、朱熹）之后，文章介韩欧（韩愈、欧阳修）之间”。刘人熙赞同这两句话，他在《跋方望溪文集》一文中说：“学行继程朱之后，良然；文章在韩柳之间，亦不负矣。”他对桐城派另一宗师姚鼐的评价也很高，《玉津阁文略后序》称方苞、姚鼐二人为“师儒之懿者”。

但是，刘人熙不完全属于桐城派。他自述：“不祖述方姚。”

(见《蔚庐刘子文集》卷四《濂洛关闽古文辞汇纂序》)他在《复向笃生大令植书》中说：“若欲为文章气节之士，则进而求之唐（唐顺之）归（归有光），又进而求之韩欧，皆所优为。”清代桐城派于唐宋八大家之后，只推崇归有光一人，对明代其他散文家都予抹掉。刘人熙却将唐、归并提，可见他并不完全拘守桐城派的尺寸，他对古文传统的继承，取径稍宽。

刘人熙在散文体裁方面没有创新。但是，他运用传统的古文体裁，表现了一些有现实意义的观点和现实生活事件。

刘人熙论说类文章的第一篇《论昏（婚）》，论述的是“同姓不婚”的问题。该文虽是根据《周礼》与朱熹《纲目》立论，但主旨不是宣扬封建礼教。该文归结的男女结婚“必须此五世之外而后尽善也”的结论，包含了不宜近亲繁殖的生命科学原理。

《珠宝肆说》是一篇说明文，借京城一个珠宝老贾之口，说明晚清政治日益腐败。先前，外吏入京，送礼不敢送黄金白银，必购珠宝，故老贾“得利十倍”。“今”外吏入京行贿“数千金，则一纸银票，伛偻而前，取之怀中，呈之座上，宾主相视而笑”。珠宝店就“车马客稀矣”。这是一篇散文体的《官场现形记》。

刘人熙所写的记叙文，对桐城派有所借鉴，也有所纠偏。

他在《跋方望溪家训家志》一文中，称赞方苞的文章“有感人于百世之下者”。如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就感人至深。刘人熙写的《记曾文正轶事》，显然接受了方苞“逸事”的影响。该文写曾国藩自直隶总督移节金陵，除夕之夜，全家欢聚，夫人欧阳氏举酒杯祝贺，祝贺“大功告成”。接着写：

公（曾国藩）闻之，恍然曰：“吾自省，惟欠一事耳。”侯（曾侯）夫人率子妇皆竦立请命。公曰：“惟欠一死耳。”

这段文字，记叙描写，都借鉴了桐城派文章“简质”“洁净”（姚鼐《与陈硕士》语）的特色。又表现了曾国藩晚年功高思危、希望善终的心理，字里行间有桐城派追求的“神韵”（方宗诚《桐城文录序》）。

刘人熙曾批评“于今”那些学桐城派的“学者”，“恭然疲役，从事无用之空文”。（见《濂洛关闽古文辞汇纂序》）他在通州五载写的那些八国联军侵犯天津北京的文章，以及在广西五载写的那些法军侵占越南的文章，都记述了许多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历史事实，而且许多史实是作者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行文也避免了桐城派记叙文“舍事实而就空文”（刘师培《论近世文章之变迁》语）的弊病。

四、刘人熙的诗歌成就

刘人熙的诗歌成就，超过了散文成就。

刘人熙的诗歌风格，基本上属于宋诗派。清代的尊唐诗派，只学唐，不学宋；尊宋诗派，则既学唐，又学宋。刘人熙的诗，也是兼学唐宋。他对唐代的李白杜甫评价很高，《正有六首》（《蔚庐亥子集》卷三）说：“李杜文章杰。”他受杜甫诗影响更深，《过湘潭杜公草堂》诗（《蔚庐亥子集》卷四）表达了他对杜甫的深深怀念。他在赠友人梁节庵的诗中说：“苏黄以下少斯人。”（《蔚庐亥子集》卷四）说明他将宋代苏东坡、黄庭坚的诗奉为标准。他在赠胞弟刘人蓉的诗中又说：“苏陆耽风骚，梦中得丽藻。”（《蔚庐四十五自定稿》）又说明他对苏东坡、陆游诗的喜爱。他在《困于通州，诗示冲儿》诗中又说：“千秋同一泪，写入示儿诗。”

(《蔚庐亥子集》卷一)表明他在做人与做诗两个方面,都以宋代爱国诗人陆游为榜样。这些例子,说明他受宋诗影响很深。晚清诗坛,先有道光、咸丰年间以何绍基(1799—1873)为代表的宋诗派,继有同治、光绪年间以陈立三(1853—1937)为代表的同光体。但刘人熙均不是这两个尊宋诗派的成员。

刘人熙的诗,有以下几点鲜明特色:

第一,充满忧国忧民的情思。刘人熙曾概括自己诗歌思想内容的特点是“一片忧家爱国心”(《蔚庐亥子集》卷三《又寄瀛潞》)。他有相当多的诗,为“忧家”之作,表现了对家人亲戚的真挚感情。但是,他的诗歌题材,没有局限在家庭的小圈子里。如《怀归》诗:“但知一家饱,安知一路哭。”“生民多厄运,处处忧飧粥。”(《蔚庐亥子集》卷一)又如《甲辰》诗:“全家庚子得生还,骂贼投戈一寸丹。”贼,指八国联军(《蔚庐亥子集》卷二)。这些诗,将忧家与忧国忧民的两种情思结合在一起。他还有一些诗,直接抒发了忧民爱国之情。如青年时期写的《哀鸿篇》(见《补过精舍诗草》),表达了对山西大饥荒人民痛苦的深切同情。又如甲午年写的《闻遣礼部侍郎张荫桓议和》(见《蔚庐诗稿》),表达了对日寇侵略、清政府怯弱的悲愤。

第二,运用新名词,创造新意境。戊戌(1898)以前的一两年,梁启超、黄遵宪、谭嗣同应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在湖南筹办新政,同时鼓吹“诗界革命”,提倡在旧体诗中运用新名词,表现新意境。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日本著《饮冰室诗话》,继续提倡“诗界革命”。光绪二十二年(1896)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刘人熙寄居河北通州王芝祥家,没有参加梁启超、黄遵宪、谭嗣同在湖南筹办的新政与鼓吹的“诗界革命”。但是,他在以后的诗歌创作中,接受了“诗界革命”的影响。

《蔚庐亥子集》中多次出现新名词。有新的政治名词，如“既阐民权公理，横来革命风潮。”（卷一《留别南昌士友》）“独立振人权，合群张国旗。”（卷四《舟次灵川》）有新的人名词，如“欧西亦有斯宾塞，高论钩玄在合群。”（卷一《题陈祖善日记》）“人间千万哥伦布，可否扪参尽太空。”（卷二《铅华八首》）有新的地理名词，如“放眼五洲争自立”（卷一《题陈祖善日记》）、“欧美纷纷叩客关”（卷三《破浪》）。这些新名词，体现了刘人熙诗词语言的创新。

《蔚庐亥子集》中还多次出现新的科技名词，并构成了新意境。如“电飞报我发梧州，满拟轻舸趁上流。”（卷三《又寄铁珊》）“飞轮渡海促登程”（卷三《梁彤云赠我三桂六株》）。这两首诗分别写了电报与轮船，较之前人的江海诗，表现了通讯与交通的新形象。又如“更开飞艇新航路，下视环球数点烟。”（卷四赠覃天存军官诗）晚唐诗人李贺《梦天》诗，有“遥望齐州九点烟”的名句，想像奇特。刘人熙这首诗，想像未来的空军开辟新航线，下视环球五大洲，也不过数点烟，有推陈出新之妙。又如“南北冰洋绝不通，东西轮转一环同。”（卷二《铅华八首》）这首诗运用了南冰洋、北冰洋的新名词，同时表现了地球公转、自转的新形象。这些新名词新形象，表现了刘人熙诗歌意境的创新。

第三，为湖湘文化增添了新亮点。刘人熙在《船山学报叙意》中说：“不佞湘产也，在湘言湘。”他也写了一些湖湘诗，其中尤以描写故乡浏阳的山水与物华的诗篇，具有新的诗情画意。

《浏水棹歌六首》（见《蔚庐四十五自定稿》），生动地表现了浏阳河自然风光与水上生活之美。如其一：“双溪流到状元洲，洲畔春波碧似油。”写浏阳河水面碧透。其二：“杜鹃花发啼山鸟，斜日张帆曲尺滩。”写浏阳河两岸鸟语花红、风和日丽。其六：

“魁山潭上有乳香，潭下鮀鱼十丈长。”写浏阳河物产丰富香美。

《菊花砚铭》十首（见《蔚庐骚赋铭赞》），从多方位多角度描写了浏阳特产菊花石外形与内质之美。如其二：“围山峨峨，浏水洋洋。沐日浴月，醉雪酣霜。”这四句写菊花石产于巍峨的大围山下，洋洋大观的浏阳河畔，得山川之精华，日月的沐浴，雪霜的陶醉，因此光耀南邦。又如其八：“不雕不琢，太璞独完。惟妙惟肖，体质天然。”这四句写菊花石体质之美，不是靠的雕琢，而是出自天然。

清前期赵翼说：“从来词客例浮湘。”（《浮湘》）在刘人熙之前，浮湘的名篇已很多，但是，历代词人进入浏阳河采风的却很少见。刘人熙的上述诗篇，为湖湘文化增添了新的亮点。

刘人熙还有一些湖湘诗，为怀念乡贤之作。他在《节〈楚宝〉目录提要》（见《蔚庐刘子文集》）中引友人语：“楚国先贤遗墨，当为楚人所宝。”这说明他很重视继承湖湘文化传统。他的诗集中有两首在北京西郊祭拜明代宰相与茶陵派领袖李东阳之墓的诗。李东阳墓，自清代嘉庆六年（1801）法式善等人重修后，至清末已荒凉八十多年。刘人熙的这两首扫墓诗，使李东阳这块被历史尘封的湖湘文化里程碑重新露出光辉。刘人熙还在多首诗中，缅怀了王夫之的崇高人格与千古不朽的学说，为湖湘文化中描绘历史名人的画廊增添了新的画卷。

五、 刘人熙著作简介

本书所收的刘人熙著述，包括刘人熙生前已刊刻的全部诗文。

刘人熙的诗集，分为《蔚庐刘子诗集》与《蔚庐亥子集》两

本大集。

《蔚庐刘子诗集》又分为四个专集。

第一个专集为《补过精舍诗草》。补过精舍，是刘人熙同治九年（1870）27岁时为浏阳枨冲老屋一间书房所取的名称。其子刘瑞翀说：“家大人所为诗，丙子（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以前少作，不下千首。独删存丙子至庚辰（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诗数十首，为《补过精舍诗草》。”（转引自《蔚庐亥子集·跋》）这就是说，在光绪二年（1876）以前，刘人熙已习作旧体诗千首以上。但是，他对诗作自我要求严格，悔其少作，全予删掉。他刊刻第一个诗歌专集时，只保留了光绪二年至光绪六年（1880），即33岁至37岁，四年间所写诗词24首。

第二个专集为《蔚庐四十五自定稿》。其子刘瑞翀说：“辛巳（光绪七年），遭皇祖妣黄太君之丧，辍弗作。甲申（光绪十年）后始有诗，至戊子（光绪十四年），自定为《蔚庐四十五自定稿》。”（同上文）这就是说，从光绪七年（1881）至光绪九年（1883），刘人熙居母丧，未作诗。光绪十年（1884）才继续写诗。他的第二个诗歌专集，收的是从光绪十年（1884）至光绪十四年（1888）五年间的诗。光绪十四年，他45岁，别号蔚庐，故这个专集以别号与岁数作书名。

第三个专集为《蔚庐诗稿》。其子刘瑞翀说：“丙申（光绪二十二年），门人渑池张先生劭仲诸人从日记中，抄录戊子以来九年之诗，为《蔚庐诗稿》。”（同上文）这个专集，是门生张劭仲等人，从刘人熙的日记中抄录的，收集的是从光绪十四年（1888）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九年的诗。

第四个专集为《蔚庐骚赋铭赞》。骚，指骚体诗。赋、铭、赞，这三种体裁半诗半文，介于诗与文之间。明清有些文集将三